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2006

中国全面兑现“入世”承诺后，广泛卷入世界市场竞争的中国企业面临的经济外交问题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应对国际摩擦和争端中，亟需了解中国经济外交政策、法律和发展趋势，以及国际贸易的最新变化、世界市场、公关谋略和谈判技巧；同时，外国政府和国外企业也非常希望得到中国经济外交的深度可靠信息。

中国经济外交 2006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 编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2006

中国全面兑现“入世”承诺后，广泛卷入世界市场竞争的中国企业面临的经济外交问题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应对国际摩擦和争端中，亟需了解中国经济外交政策、法律和发展趋势，以及国际贸易的最新变化、世界市场、公关谋略和谈判技巧；同时，外国政府和国外企业也非常希望得到中国经济外交的深度可靠信息。

中国经济外交 2006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 编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外交. 2006/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300-07916-5

I. 中…

II. ①清…②清…

III. 国际经济关系: 中外关系-研究

IV. F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6604 号

中国经济外交 (2006)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0 mm×25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9.5 插页 3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9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2005年,中国经济外交取得了辉煌成就。财金合作、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引进来、走出去、争端解决……双边和多边经济外交均有建树,内外瞩目,有口皆碑。

2004年8月,中共中央举行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国家领导人首次提及“经济外交”。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温家宝总理强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外交越来越成为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家宝在随后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前接见会议代表时说,必须从国际政治经济的总趋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外交工作的总方针这3个方面充分认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上做了《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系统论述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的指导思想。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全面加强经济外交工作。

为使中外了解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为提高商、政、学各界的经济外交素养,方便今后经济外交的深入研究,我们应读者要求,每年出版《中国经济外交》研究报告。本书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国际市场与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摩擦与争端解决;经济外交规则的最新变化;国际市场与中国海外投资;中国企业国际风险与经济安全评估;



世界经济预测等。

2006 年是中国全面实现“入世”承诺的第一年，也是中国企业全面卷入世界市场竞争的第一年。入世 5 年来，中国经济外交取得举世公认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争端、冲突和诉讼，外国对中国企业出口、引进和并购的歧视和限制也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应对国际摩擦和争端中亟需了解中国经济外交政策、法律、发展与国际市场的最新变化；同时，国外企业也非常希望得到中国经济外交的深度信息。《中国经济外交》年度报告不仅为政府制定经济外交政策提供信息，也为企业制定国际化战略提供依据。

经济外交有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不少国内外机构和专家对此都有深入的研究，《中国经济外交》（2006）努力全面介绍经济外交的史事、数据、统计分析，为今后的经济外交决策、研究和实践提供服务。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5 年 1 月，有一批专职和兼职的国内外经济外交、经济安全和国际化战略研究的学者和教师。《中国经济外交》是我中心年度报告，每年适时出版。

感谢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财政部、外交部、海关总署、商务部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福迪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临汾同时达实业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博闻一方等企业的大力支持。

敬请读者关爱本报告，使本报告越办越好。来信请致：hemaochun@263.net。

何茂春

2006 年 10 月

目 录

第 I 篇 总论

第 1 章 中国经济外交历史的简单回顾 (1949—2001 年)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的经济贸易 → 3

社会主义对外经济贸易的建立 → 4

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 → 7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 → 14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 → 21

改革开放到中国“入世”时期 (1978—2001 年) 的对外经济贸易 → 25

中国“复关/入世”历程 → 35

第 2 章 2005 年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 → 40

2005 年中国经济发展 → 40

2005 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及问题 → 55

第 3 章 “十五”规划完成情况和“十一五”商务规划 → 65

“十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的成就与不足 → 65

“十一五”规划中的对外开放战略和商务部“十一五”规划 → 71

第 4 章 2005 年中国海关、涉外税收与外汇平衡 → 83

海关税收 → 83

涉外税收 → 89



外汇储备 → 93

第5章 2005年中国财金外交 → 99

对外财政合作 → 99

对外金融合作 → 112

第6章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对外援助 → 119

对外承包工程 → 119

对外劳务合作 → 127

对外援助 → 135

第7章 2005年中国涉外投资 → 145

利用外资 → 145

海外投资 → 158

第Ⅱ篇 分论

第8章 双边经济外交 → 175

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经贸关系 → 175

中国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 → 186

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关系 → 195

中国与北美国家的经贸关系 → 201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 → 206

中国与大洋洲国家的经贸关系 → 210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 → 212

双边自由贸易区 → 219

第9章 多边经济外交 → 232

中国与WTO → 232

中国与八国集团 → 236

中国与联合国、世界银行 → 237

中国与经合组织 → 240

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 → 241

中国与区域集团 → 242

第Ⅲ篇 经济外交实务

第10章 “引进来”战略 → 247

加入WTO以来中国利用外资回顾 → 247



今后中国利用外资发展趋势预测 → 251

中国技术引进的问题及对策 → 254

第11章 “走出去”战略 → 260

“走出去”战略的必然性和意义 → 260

“走出去”战略的主体：具有强竞争力的企业 → 262

“走出去”战略的支持政策 → 264

第12章 国际争端解决 → 267

国际贸易争端的现状和中国的对策 → 267

中国运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端的可行性和对策 → 273

第13章 企业国际化与国际市场拓展 → 280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280

企业国际化成功案例——东软集团的国际化之路 → 283

中国企业国际市场拓展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 286

企业国际市场拓展的成功案例——海尔在美国的市场拓展 → 288

第14章 跨国并购操作 → 292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特点和动因 → 292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 → 298

中 国 经 济 外 交

第 I 篇

总 论



中国经济外交历史的简单回顾 (1949—200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的经济贸易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政府对外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除割地赔款、开辟租界外，还给予外国侵略者在华驻军、领事裁判、协定关税、海关管理、内河航行、兴建铁路、设立银行、开矿办厂、自由经商等军事、政治和经济特权。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了严重破坏，对外贸易也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加快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培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共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使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社会。

帝国主义列强于 1843 年取得了协定关税特权，从 1853 年起又逐渐侵占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英国和美国把持总税务司职位。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自 1882—1913 年，各通商口岸的外商由 440 家猛增到 3 805 家，向商品流通领域的各个环节和其他领域，迅速扩张他们的势力，从而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以及外汇、金融、航运、保险、商品检验等有关事业。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开办了各种垄断性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多为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代理商。

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生丝、茶叶、桐油、猪



鬃、大豆、花生、锑、钨等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商品除 1913 年前鸦片居首位外，主要是棉织品、毛织品、煤油、汽油、香烟、洋酒、食品罐头、糖果、化妆品、玻璃、丝袜等消费品和奢侈品。据统计，自 1873—1947 年，每年进口的机器设备从未超过进口总额的 10%。洋纱、洋布、洋油等充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贸易对象主要集中在英、日、美、德、法、俄等少数国家，它们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是随着它们经济、政治实力的消长而变化的。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英国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占 80% 以上，几乎处于独占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美国趁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混战无暇东顾的机会，进一步扩大了对华贸易，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比重一跃而居第一位和第二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在华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美国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居于垄断地位。据统计，1946 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51.2%，向美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57.2%。对外贸易长期入超和不等价交换。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倾销商品，使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自 1877—1949 年的 73 年间，年年入超，总额达 64 亿美元，造成金银大量外流。



社会主义对外经济贸易的建立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全国胜利后逐步实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经济政策，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指明了方向。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经过以下 3 个重大步骤，全面建立起了中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

统制对外贸易

在已经解放的城市，中共中央政府立即统制对外贸易。在全国范围没收官僚资本的过程中，原国民党政府的对外贸易机构，如中央信托局、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等，都由中共中央政府接管。中共中央政府对所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造和重新组织，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国有外贸企业。



对于外国在华的进出口企业,在取消它们的特权后,允许它们在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前提下继续营业。1950年,美国政府无理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相应宣布管制美国政府和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从此在华美商全部停止。在1951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后,其他外商大都陷于瘫痪状态,陆续放弃经营、申请歇业或作价转让给中国政府。1950年,在中国境内有外商540多家,进出口额占中国对资本主义市场进出口总额的6.52%;到1955年底,只剩下28家,在全国对资本主义市场贸易中的比重下降为0.005%。^[1]

外贸国有化

1949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府领导下成立了贸易部,部内设国外贸易司;1952年9月,中央贸易部分为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同时,在中央贸易部和对外贸易部的统一领导下,先后组建了地方对外贸易管理机构。

1950年,中央贸易部在该部国外贸易司设立了经营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中国进口公司,经营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中国进出口公司,以及中国畜产、油脂、茶叶、蚕丝、矿产等国营外贸公司。1953年,对外贸易部对原有国营外贸公司进行调整,组成14个专业进出口公司和2个专业运输公司,以后又多次进行调整改组,以改善经营分工。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这些国营外贸公司,统一经营全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逐步统一经营对资本主义市场重要物资的进出口业务。它们建立伊始,就在对外贸易经营中起主导作用,1950年,国营外贸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68.4%,1952年上升到92.8%,占有绝对优势。

改造私营进出口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口岸共有私营进出口商4600家,从业人员3.5万人,资本1.3亿元(按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折算),经营额约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2,其中出口额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一半。政府对它们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并通过



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逐步对他们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对私营进出口商严格实行对外贸易管制。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外贸易部门在继续发挥私营进出口商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逐步加强了对他们的限制和改造：（1）各国营外贸公司实行“按行归口，统一安排”，加强对私营进出口商的领导，把他们的业务经营基本上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2）严格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管理，并从货源渠道、经营范围、外汇审批、国家税收、银行信贷等方面加强限制。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和重要工业原料逐步实行统购统销和对外统一出口，规定私营进出口商不得自营一般商品的进口业务，并相应停止了批汇。（3）采取联购联销、代进代出、私私联营、公私联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引导私营进出口商逐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4）区别不同情况，贯彻“逐渐地稳步地代替”的方针。对有经营能力，亦有货源，或在国内外较有影响者，予以维持利用，使其有生意可做，有合理利润可得，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对没有经营能力，名存实亡，或处于半停业状态者，予以代替，引导转业；一时难以就业的人员由国有公司按行业归口包下来，妥善安置。（5）对同外贸有关的国内私营企业，也相应进行改造代替，由国营外贸企业掌握茶叶、蚕茧、皮毛等收购和批发业务。

经过改造和代替，到1955年底，私营进出口商由1950年的4600家减少到1083家；从业人员由3.5万人减少到9994人；资本由1.3亿元减少到4993万元；其进出口额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31.6%下降到0.8%。

1956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私营进出口商也迅速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合营后，根据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工作的需要，迅速对原来的商号进行合并改组，参照国营对外贸易公司的制度，按行业成立专业性的公私合营公司，也有少数商号直接并入国营对外贸易公司。当时，全国共成立了54个公私合营对外贸易公司。这些公司的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资本家原来占有的资产已经转由国家支配和使用，他们除了拿定息之外，已经不能支配这些资产。他们也不可能以资本家的身份去掌握经营管理权和人事调配权，合营公司已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至此，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领域已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起社会主义对外贸易。



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

贸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政府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和援助。美国对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禁运措施,并于1950年9月在武装干涉朝鲜后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和挑衅。1951年5月又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门,针对美国的“封锁、禁运”措施,大力组织抢运滞留国外的大批物资,使国家的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根据恢复国民经济和抗美援朝的需要,及时进口了大量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以及抗美援朝所必需的重要物资和原材料,如钢材、有色金属、化工原料、橡胶、机床、拖拉机、化肥、农药、车辆、船舶、飞机、石油,以及调剂供求稳定市场所需的棉花、砂糖、动植物油、纸张、手表等物资,并相应组织了农产品和一些原料产品的出口,如大豆、桐油、茶叶、猪鬃、肠衣、蛋品、厂丝、钨砂、水银和绸缎等;同时积极开展对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的贸易,同美国策划的“封锁、禁运”进行坚决斗争。1952年9月,时任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对外贸易》一文中做了如下回顾:“三年来,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肃清了对外贸易的半殖民地的依赖性,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对外贸易关系。我们已经由历史上长期入超的国家,转变成为进口和出口平衡的国家,战胜了美帝国主义者对我们中国的禁运和封锁。我们通过对外贸易的管理,扶助了国内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我们的进口和出口货物的数量,都在不断地增加。这样,就使我们的对外贸易出现了新的局面。”^[2]

1952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1953年开始进行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作围绕“一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有计划地积极扩大出口,除了出口传统的农副土特产品外,还增加了许多新商



品，如棉纱、棉布、钢材、五金、玻璃、金笔、缝纫机等，并大力组织国家经济建设所必需的机器设备、工业器材和原料，以及其他重要物资的进口。为了进一步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广泛发展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特别是促进中国同西方国家贸易关系向正常化发展，中国政府外贸部门继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对策和措施。

自1950—1957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在积极加强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友好合作和不断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过程中，得到较快的发展。

着重发展对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与贸易

中国政府本着“积极协作、平等互利、实事求是”的方针，大力开展对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贸易，使中国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的贸易额有了很大的增长。1957年，对前苏联进出口贸易额为13.64亿美元，比1950年的3.38亿美元增长3倍多。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迅速扩大，不仅弥补了“封锁、禁运”所造成的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急剧下降，而且使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有了迅速增长。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自1952年起到20世纪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前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

从1952年开始，中国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技术，主要是前苏联所援建的“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包括钢铁、有色金属、重型机器、汽车、航空、煤炭、石油、化工、电力、电讯等方面的企业项目和一些军工项目。这对于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特别是建立重工业的基础，以加强国防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中国还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了机械、仪器、车辆、船舶和原材料等物资。同时，中国供应给它们十分需要的战略原料和其他重要物资，如稀有矿产品、稀有金属、有色金属、大豆、大米、食用植物油、冻肉、茶叶、桐油、绸缎、呢绒、棉布等，有力地支援了它们的经济建设。

当时，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支持中国的反禁运斗争。针对美国的“航运管制”，中国租用前苏联、波兰等国家船舶承运进口物资；同时成立了中波轮船公司，办理中国对欧洲各国进出口货运。

逐步打开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的局面

从1950年起，中国政府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



国政府建立了双边贸易关系，并同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开展了民间贸易往来。1952年，锡兰（后改名为斯里兰卡）的主要出口商品橡胶因美国禁运而价格大跌，同时国内粮食供应困难。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下，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以公平合理的比价，同锡兰政府部门签订了《中锡大米、橡胶五年贸易协定》（简称《米胶协定》）。这是反禁运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开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尚未建交的国家开展政府间贸易的新路，创立了平等互利、友好合作贸易关系的范例，促进了中国同东南亚国家贸易关系的发展。

1955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阐明了中国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增进了亚非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亚非会议后，中国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等许多亚非国家的贸易额有了成倍的增长^[3]，而且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由东南亚向西亚、非洲迅速扩展。中国对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贸易额由1950年的3.6亿美元上升到1957年的7.67亿美元。

大力开展内地同香港、澳门地区的贸易

中国政府把开展内地同港澳地区的贸易，作为发展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反禁运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1954年，对外贸易部召开了第一次扩大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对港澳地区长期稳定供应的政策，要如同保证内地大城市的供应一样，保证对港澳地区的供应，积极扩大内地对港澳出口及经港澳转口东南亚的贸易。经过中国内地外贸部门和驻港澳贸易机构的努力，内地对港澳以出口为主的贸易逐年稳步增长。1957年比1950年增长了22.7%。在这个时期，中国内地还通过港澳市场，以多种渠道和方式，向一些对中国实行贸易限制和歧视政策的国家转销商品，并从西方国家买进了一批“禁运”物资，这对于恢复和发展中国国民经济，逐步开拓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起了积极的作用。

努力开拓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和政府贸易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于1950年即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其中，芬兰于1953年同中国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追随美国实行“禁运”政策，同中